第一部分

东北工业部时期财务工作的回顾

安　然　赵祥骥　刘同侗

冶金财务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北工业部时期。

东北工业部正式成立于1949年5月。当时正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国接近全面解放。中共中央确定了重点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的伟大战略决策。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旧中国，东北地区工业相对较有基础，特别是钢铁工业，其设备能力占全国80%。因此，重建东北工业，对于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准备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战争的破坏，整个东北工业当时已是满目疮痍，奄奄一息，损失极大。另一方面，我们接管工业的大批干部，主要来自部队和地方党政部门，对工业知之甚少，甚至一窍不通。这就是当时东北工业部所面临的客观和主观的双重困难。正是在这样的重要时刻，以王鹤寿为部长的东北工业部，根据中共中央及其东北局的指示精神，组织东北工业部的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要求各级领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干部全面领会党的城市工作方针，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此同时，带领干部到企业调查研究，观摩考察，学习生产建设基本知识，从而取得了领导生产建设的主动权。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东北工业部的领导在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抓住主要矛盾，逐个地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东北工业部的领导，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经济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东北工业部在财务管理工作上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确立了工业财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即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工业财务会计工作要面向企业，依靠群众，为生产服务（后来概括为“三大观点”），确立了“大财务”的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的特点，是把财务会计工作作为企业领导的参谋和助手，积极地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信息和资料，进行核算和监督，并参与企业的有关决策。当时东北工业部领导采用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就是抓经济工作的两头——计划和财务，来带动整个经济工作。他们对财务工作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始终强调要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务。东北工业部及其所属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财会工作为生产服务的指导思想，在“献交器材”和“创造生产新记录”的群众运动中，以及在提高质量、建立生产责任制等各项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正确地反映了这些活动的经济成果，而且促进

了这些活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群众性的‘ 献交器材运动 ”,群众几个月时间就献交出各种器材、设备几十万件，仅鞍钢一家就献交出 21 万多件,价值 108 亿元（当时的东北币），对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爱国爱厂的热情。在“ 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中 ”涌现出一大批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先进生产者，创造新纪录的人数达到 5 万多人次，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仅半年时间提高了 32.8%）,从而降低了成本,为国家创造或节约了巨大的财富，大大地加速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向企业，依靠群众，为生产服务的指导思想，后来又在重工业部时期和冶金工业部时期得到了贯彻，成为冶金系统广大财会干部代代相传的‘ 传家宝 ”,成为冶金财会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第二件大事，是在财务体制上完成了由供给制向经济核算制的转变。早在 1949 年 7 月 25 日,东北工业部就发布了由王鹤寿亲自起草的《东北工业部关于反对浪费，加强经济核算的决定》,不久,又在 1949年 9 月 23 日作出了《东北工业部关于继续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指示》。发布这两个文件的目的,是使在战争条件下长期形成的不讲核算、不讲成本、不讲效益的供给制体制转变到初步建立成本核算、资金管理和按合同订货等按经济规律办企业的经济核算制体制上来。实际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次提出由供给制转变为经济核算制的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因此两个文件一出台，便立即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肯定和支持。东北

局在《东北局关于贯彻东北工业部〈继续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指示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决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表示“完全赞同东北工业部的决定”，认为“目前的经济建设与经营管理中，最基本的关键是实行经济责任制”，并号召“一切城市党委，特别是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与共产党员们认真学习。”东北局的《决定》还要求“一切地方工商企业都要认真学习东北工业部的决定，以改进管理工作、党务工作与工会工作，建立经济核算制，从建立经济核算制的运动中来实现与贯彻经营的企业化与管理的民主化。”还要求“一切经济部门：商业贸易部门、财政金融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军工军需部门的行政干部与党的组织，都要注意学习工业部的经验，有步骤地实行经济核算制，改进与提高自己的业务。”《决定》还强调提出“一切经济工作干部，一切在经济部门进行党与工会工作的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一切城市党委的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学习管理企业的知识和技术知识，使自己精通业务，成为工作内行。这就是实际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迫切任务。谁要是不认真学习，谁就将在经济建设中一事无成，谁就不能完成工作任务，谁就会落伍。反对把政治抽象化，反对脱离生产，脱离围绕生产的各种实际工作而空谈政治。提倡做什么学什么，要认真地学，苦心钻研地学，以马列主义的观点与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学习业务，提高业务水平，改进工作，完成与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这就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主要的学习方向。”

东北工业部关于加强经济核算的决定，不仅在东北地

区引起巨大反响，事实证明，它的影响所及，后来随着全国的陆续解放，很快又扩大到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工矿企业和经济部门。1951 年 4 月 20 日,中央重工业部发出了《关于在直属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指示》，要求直属企业 1951 年做好基础工作，建立经济核算制。从而使经济核算制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处不在的地步。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东北工业部在《决定》中提出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当今的企业管理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决定》强调：经济核算的中心任务是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开展反浪费的群众运动，要求生产和基本建设要有定额，要加强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提高技术熟练程度，表扬先进，开展竞赛，实行正确的工资政策。《决定》还第一次提出在工业企业实行激励机制的要求：“ 为了鼓励降低成本，可试行超计划利润的奖励制度 ”。《决定》还要求，东北工业部及所属各管理局的销售部门要制订产品销售计划及推销计划，并有重点地试行合同制。要求各局、各公司厂矿认真检查上半年的投资使用情况，总结经验，并具体计算出有哪些节约和浪费。

实行经济核算制在财务会计工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沈阳解放后，东北工业部其所属 10 个管理局（煤矿、机械、电工、纺织、轻工、造纸、有色金属、金矿、军工、建材）和三个直属企业（鞍钢、本溪煤铁公司、抚顺矿务局），仍沿袭供给制的方法。各基层企业单位进行正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少量现金的调配及其所产产品的分配，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要首先向各管理局申请，由东北工业部统一进行，其经济往来也一律通过东北工业部转账；涉及两个部之间的企业经济往来，则要经过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转账。各企业单位之间往来账目浩繁，非常复杂。在这种体制下，财会人员整天疲于奔命，忙于账面上的数字，显然不能适应当时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企业职工、领导不关心本企业的生产、质量、成本、销售、利润等，因为一切均由国家一包到底，即使发生亏损，也不影响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单纯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劳动竞赛和搞政治运动等等，很难经常保持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的办法就是学习苏联行之有效的经济核算制。

所谓经济核算制，实际上是国家赋予企业一定的独立自主权与相应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使其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彻底摆脱供给制的羁绊，以调动基层企业单位领导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事实证明，经济核算制确实是当时经济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巨大作用。如当时沈阳机械三厂在实行经济核算制过程中，创造性地实行了“厂内本票制”，即厂里将分配给各车间的流动资金，以“厂内本票”下拨到各车间，车间所需的原材料、资金，则以本票支付，交库的产品则以本票收入。这项办法，实际上就是今天实行的“厂内银行”制的雏型。

东北工业部在财会核算业务建设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为东北地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以后冶金财会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东北工业部会计室在有关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主要有以下内容 东北工业部所属企业统一会计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流动资金管理办法；财务计划编制办法；会计事务处理细则；行政单位经费报销办法；供应处暂行会计制度；企业年度决算办法；工业产品成本暂行计算规程（名字可能不准确）清产核资办法；1949年度决算折合“工分”办法。

为了统一会计制度，东北工业部共编制了三个年度（1949～1951）的会计决算。其中1949年的会计决算，因解放伊始，没有新的资料可供参考，基本上是按解放前的旧体例编制的。1950年的则有较大的突破，主要是会计室主任当时有一个新的倡议，他认为会计核算作为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手段，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理应全面而及时地反映已经确定的产量、成本、销售、利润等主要计划及其完成情况，以便随时可以从账上、表上了解各项计划的完成程度，作为分析研究、改进管理的依据。会计室设计组根据上述倡议，设计了一系列相应的会计科目和报表，基本上达到了倡议的要求。

总起来看，当时东北工业部由于确立了财会工作为生产服务的指导思想，因此在财会工作为生产服务方面，思想比较解放，工作比较大胆，为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当时东北工业部从固定资产中将低值易耗品单独划分出来，并且制定了价格标准，在企业中试行了超计划利润留成办法，对调动企业积极性，对发展生产有利。不仅受到企业的欢迎，而且得到财政金融部门

的积极支持。财政金融部门所以积极支持东北工业部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东北地区工业在全国先行一步，工作比较有基础，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制度办法。另一方面，当时包括财政金融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内，绝大部分是刚从部队和地方转到工业战线的，如何办工业，财政金融工作如何为生产建设服务，大家都心中无数，都拿不出现成的办法，只能按照《实践论》的观点，在工作实践中进行实践与探索。这也是财政金融部门支持东北工业部所提出的一整套制度办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 1951 年 5 月 21 日，在东北工业部召开的第二届成本会议上，吕东副部长作了题为《为降低成本而奋斗》的报告。报告认为两年来的基本成绩是：打下了成本管理的初步基础，编制了成本计划，建立了成本核算制度，有些单位比较及时地算出了实际成本等。报告也指出了成本管理工作存在的缺点：成本工作没有发挥对生产的监督与指导作用，成本计划存在严重的保守思想和本位主义，成本管理缺乏费用控制和事后缺乏分析比较，因而不能及时暴露企业管理中的缺点及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的潜力。吕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国营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是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扩大国家积累。而为了扩大积累，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设备能力，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运用各种方法降低成本。在讲到“关于加强成本管理”问题时，吕东强调：第一，成本计划一经批准，即成为企业必须完成的法定任务；第二，成本计划一经批准，

一切开支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只准降低，不准超支。在这个报告中，吕东还第一次提出要在企业中推行车间和班组经济核算的要求。他说“事实证明，凡是把经济核算推行到车间、班组并配合奖励制度与合理的工资制度的地方，就能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职极性和创造性。为了切实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吕东还提出要把推行车间、班组经济核算作为当时的一项中心任务，要做好准备，划分车间、培训干部和建立规章制度，并要求先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开来。

第三件大事，是在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招聘、举办训练班和办专门学校等途径，培养了一大批财会人员，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了干部条件。沈阳一解放，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经济处与不久后由哈尔滨迁驻沈阳的东北工业部合并，在招聘和培养财会人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是招揽流失的财会人员。沈阳解放前，原材料、能源，特别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主副食极端匮乏，“米珠薪桂”，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许多工矿企业陷于停产、倒闭状态，职工因饥寒交迫，不遣自散，流离失所，有的则投奔了解放区。沈阳一解放，为了恢复生产，沈阳军管会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招揽人才，其中招收的财会人员大部分回到原单位工作，少部分因企业调整，分配到了其他单位。二是就地招聘财会人员。沈阳解放后，除市政府职员全部留用外，辽宁省政府及其他省市驻沈人员自愿参加东北九省接收人员学习班，一部分人后来应聘到东北工业部，被分配到部、局两级机构。刘同倜同志就是当时被分配到

东北工业部的会计师之一。三是成立财会人员短训班。培养的主要对象是失业人员中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无一技之长的，通过短期培训后分配工作。四是在关内招聘高级财会人员。东北解放后，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部所属的局、公司及基层企业的财会人员虽经一再补充，仍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工业部便决定，通过驻沪招聘机构，在关内各大城市广泛招聘高中级财会人员。其中分配到东北工业部经理处会计室的会计师有葛定邦、李汉超、吴锡涵、周玉清、陈秀生、邹继芳、许威百、张志成、沈苏亚、查师真、徐有声等同志，自大学和专科学校分配和召聘的有林琼泉、陈唐尧、龙建勋、黄孚尹、钟礼华、陈忠义、陈瑞康、范凌燕、蔡书淮等同志。五是创建财会专科学校。沈阳解放前，原省立沈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中设有财会专业。东北工业部接管后，东北工业部派专人在该校兼授成本会计课程。1950 年，教育处以该校为基础,在吉林成立工业会计统计专科学校,后迁址长春,更名为东北工业会计统计专科学校,分大专、中专两部分,并各设会计、统计两个专业。1954 年秋，院系调整，改为长春计划经济学校(中专)。这所学校,为东北工业系统输送了一大批财会经济专业人材，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成长为经济领导干部。

当时，东北工业部的财会机构是：东北工业部设有经理处，经理处下设业务室、会计室、供应室，后又增设成本管理室，共四个室。处长开始是唐克，后为赵书扬，副处长刘炳华、郝克勇，吕东副部长分管经理处。会计室分

岁计、会计、出纳三个科，后增设审计科。室主任安然，副主任刘金栋，组成人员有吴运来、杨鸿起、李昶旭、潘笑愚、陈珊、崔淑范等，以及在沈阳招聘录用的刘同倜、杨希滋、胡兴亚、傅永林、张博强、杨乃奇、鲍绍俊、梁宝亨等同志，会计室的机构逐步扩大。不久，唐克调任基建处长，安然晋升为副处长，仍分管会计室；后来王剑虹增任为会计室副主任。

业务室主任贾洪，其所属的成本科负责制订《成本计算规程》，与会计室共同编制计划。

1950 年以后陆续分配到东北工业部的财会专业大学生就更多了，其中有杨继良、陈其章、夏慧蓉、张元白、吴秀珍、杜晶、辛忠恕、陈文秀、林明权、居丽珍、王荫泰、张静渊、曹惠欣、刘玉华、陈惠琴、林书敏等同志。这些同志为我国冶金工业财会工作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班组经济核算是企业管理的坚实基础

朱德惠 陈 炯 佘廷岭等

班组经济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这两项经验，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在冶金系统内得到了广泛推广，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并被组织推广至其他行业，它和“经济活动分析”曾被誉为冶金行业财务管理的两大法宝，它们曾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作出显著贡献。经过多年的实践考验，班组经济核算至今仍然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企业基础管理工作，不少企业仍沿用着并做了新的发展。它扎根于群众之中，是广大工人群众管理企业的有效工具。

一、班组经济核算的由来

班组经济核算，是根据节约时间规律的要求，对企业最基层——班组的生产活动进行严密的记录、控制、计算、分析、评价与考核，以期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成果，它是企业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基础核算形式，是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基础。

50 年代初期，冶金工业在经历战争创伤后恢复建设，进入“一五”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当时全国正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企业领导急需了解广大工人群众直接创造的生

产成果，而广大工人群众也急于了解其所在劳动中所发生的生产耗费与效益，许多企业都在为此作积极探索。 1952 年初,山西省大同煤矿第二矿有两个小组试行班组核算,继而在全矿推广。同年，天津钢厂推广该厂刘长福小组的核算经验，1952 年 9 月《工业会计》月刊介绍了这个核算经验和具体做法。1953 年初，当时在鞍钢炼钢厂任厂长的马成德(后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翻译发表了《马丁炉车间内部的经济核算》一文，文中介绍了苏联库兹聂兹克公司的马丁炉车间进行内部经济核算的做法。鞍钢炼钢厂结合实际,试行了“定料炼钢”“按炉核算”,取得了成效。1953 年 9～12 月的 4 个月中，仅钢铁料消耗就比上年减少了 13800t ,比计划定额降低 3900t ,产品成本逐月下降,比全年节约任务还多节约 37%。实行“定料炼钢”后，基本上消灭了平炉炉后放渣跑钢现象，提高了熔炼收得率，增产钢 8000t。1953 年末，鞍钢章一梁（当时为会计处会计师）翻译发表了苏联里伯涅赫塔钢管厂轧制车间实行的《班组节约核算账》和苏联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工厂重轨梁车间的《班组节约核算账》。1954 年初,鞍钢许笃谭(当时在计划处工作）撰写的《炼钢厂怎样准备并进行工段经济核算的》和《怎样建立“定料炼钢”制度》文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鞍钢炼钢厂开展核算的情况和所获得的成果。该文在鞍钢《先进生产者》第 5 期和重工业部的机关刊物《重工业通讯》第 15 期上发表，把鞍钢试行基层经济核算的情况介绍给了全行业。在此期间，鞍钢会计处成本科业务研究小组翻译发表了《苏联会计杂志》上的《车间经济

核算活动成果，按日计算和公布的组织》一文，从各方面介绍了苏联冶金企业开展内部经济核算的方法。本溪钢铁公司也于 1954 年下半年开始在一厂进行班组核算试点，取得效果后，于 1955 年在全公司普遍推广。鞍钢各试点厂效果显著，炼钢厂、初轧厂、中板厂，无缝钢管厂等都相继取得了好成绩，在当时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1954 年，鞍钢主管经营、财会工作的副经理阎志遵（后任冶金部政治部副主任）在所作题为《全面实行班组经济核算，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总结报告中，介绍了鞍钢 1953～1954 年全面开展班组经济核算的经验,该文刊登在《重工业通讯》1954 年第 36期上，该杂志还同期发表了题为《推行班组经济核算，争取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社论和财务司副司长安然（后曾任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财务司司长，冶金工业部政治部负责人）的《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班组经济核算，为扩大资金积累开辟道路》 的文章，这是重工业部推广这项经验的开端。同年，重工业部及时地在鞍钢召开了重工业系统的班组核算现场会，把鞍钢的经验推向全系统，并正式把这一核算形式命名为“ 班组经济核算 。

重工业部的领导十分重视推广班组经济核算工作，总结出推行班组经济核算的四大优点。第一，由于实行班组经济核算，企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层层下达到车间、工段，使基层领导可以发动群众，每时每刻为实现这些指标而奋斗，从而保证了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第二，实行班组经济核算，能促进成本的降低，产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和质量的提高（废品减少），增加国家积累。通过发动群众，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把会计监督、经济活动分析与班组经济核算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财务管理工作的群众路线，是财务管理工作上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好方法。第三，实行班组经济核算，可使领导及时发现车间、工段的先进经验或薄弱环节，及时组织推广经验或采取解决措施，使之与改善技术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开展技术革新工作。第四，有利于改进基层领导工作，巩固生产区域责任制，发挥车间主任和工长的作用，保证产量、质量、成本等指标的完成，建立健全职工的岗位责任制，巩固劳动纪律，促进责任制的进一步巩固与提高。

1954 年 12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使经济核算成为群众性的工作》，肯定了鞍钢等企业推行班组经济核算的经验，指出“班组核算与劳动竞赛相结合是把增产节约变成经常性的重要手段。”1955 年初，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在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 1954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班组经济核算工作，充分肯定了鞍钢等企业开展班组经济核算的经验，从而极大地鼓舞了重工业系统广大职工开展班组经济核算的积极性，使这项工作更迅速而顺利地开展起来，并把它提到关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度来认识。从此，不少企业的班组经济核算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班组经济核算的开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和其他企业管理工作一样，在“大跃进”时期受到“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影响而一度停止。在“文革”中又受到严重

冲击，使已建立起来的群众核算制度毁于一旦。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渐恢复起来，1981 年财政部颁发了《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核算工作试行办法》,要求企业内部建立全面、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和适合企业特点的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相结合的经济核算体系，做好经济核算的各项基础工作。并提出了实行班组经济核算应达到的五条标准：(1）有适应生产和经营特点的核算组织；(2）有明确的核算指标；(3）有准确的核算记录；(4）有定期公布、检查、分析、评比的制度；(5）有增产节约效果。从此以后，班组经济核算成为国家规定的一项核算制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班组经济核算的顺利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冶金企业认真贯彻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转换机制的同时建立内部经济责任制，把首钢的“包、保、核”经验充实到了班组经济核算的内容，使经济责任制层层落实到了基层和群众之中。1984 年，冶金工业部颁发了《钢铁工业企业统一成本核算规程(试行)》,将班组经济核算规定为正式核算内容。1986 年 12 月，财政部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企业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班组经济核算，本着干什么，管什么，算什么的要求，采用简便可行的核算形式和方法，核算班组或个人直接掌握的单项消耗指标。”进一步把起源于冶金行业的班组经济核算正式向全国推广。

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因此必须加强基础管理工作，班组经济核算就是

适应这个需要而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有的企业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出了更为突出的新鲜经验。例如，邯郸钢铁总厂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是国有企业实行两个根本转变、加快转换经营机制的有效途径。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普遍推广邯钢经验。其具体内容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国内先进水平和本单位历史水平为依据，对组成成本的各项指标逐项进行比较，找出潜在的效益，对原材料和出厂产品均以市场价为核算参考，核定出产品的内部目标成本和目标利润，并将它们层层分解，将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落实到每一个职工身上，实现“干什么，管什么，算什么”，使职工当家理财落到实处。这一经验使班组经济核算在新的时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可以为加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好坚实的基础。

班组经济核算不仅在国内更大的范围内推开，而且引起了国际上同行专家的关注。1985 年 5 月，在韩国汉城召开的第二次泛太平洋企业经营、经济与技术交流会上，美国犹他州大学 C.R. 斯库森、J.W. 布赖克纳、L.G. 海尔等人在所发表的题为《责任会计在中国——鞍山钢铁公司的实验》的学术论文中写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给国家带来了许多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在企业管理体制上放弃了过去那种少数领导人说了算，群众跟着干的做法，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管理原则，即着重依靠班组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1952 年，有一个企业（指鞍钢）不是把它的会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资产控制和预算管理方面，而是要找出一种有效的生产活动核算方法，以便使其同突出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